

走出



前驱先路的中外交往
与文化交流的使者

国门

主编 孙占元 王玉君



山东教育出版社



走出国门

——前驱先路的中外交往
与文化交流的使者

主编 孙占元 王玉君



山东教育出版社

走出国门

——前驱先路的中外交往与文化交流的使者

孙占元 王玉君 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250001)

电话:(0531)2023919 传真:(0531)2050104

网址:<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刷:山东荣成市印刷厂

版次: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规格:850mm×1168mm 32开本

印张:20.625印张

插页:5插页

字数:476千字

书号:ISBN7-5328-3282-1/K·78

定价:25.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导 言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中国的“出国热”悄然升温,谁人能出国走一走,定会引来不少人的好奇心和羡慕感。这虽然只是表层的现象,但反映着中国深层次转型的开始。这样的社会现象自然会引来善于寻根溯源的历史学家的关注,他们以学者的敏锐才思尝试着尽可能地为社会提供一部又一部力求足以使人赏心悦目的、能够为改革开放服务的、可以展现出历史资鉴效果的著述,或是描述那曲折艰辛的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数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或是叙述那在岁月蹉跎、步履维艰的近代110年间中外文化磨合交汇的历史进程。其中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丁伟志、陈崧的《中西体用之间——晚清中外文化观述论》以及许多学者的相关著作,从不同视角做出了令人敬佩的成绩。同时,有两种有关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史料,也颇有价值。一种是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专收晚清时期国人亲历欧美和日本的记述,不但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史料,而且把近代中国人初出国门的观察与思考展示给世人;另一种是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百年馆藏库本首译新版丛书《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该丛书的编译目的是能对中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和西方人的中国观有所

裨益。这样,研究和探讨源远流长、丰富多姿的中外交往与文化交流的风雨历程,就不但成为史学界重视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中国认识世界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双向文化交流中,有许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做出了卓越的业绩。对此,江泽民主席 1997 年访问美国期间在哈佛大学所作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人早就懂得兼取众长、以为己善的道理。汉、唐时期,既是经济繁荣的盛世,也是中外交流的盛世。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玄奘万里取经,带回南亚国家的古老文化。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把中华文化传播向远方的国度。但是后来特别是清代晚期,封建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和中外交流。鸦片战争以来,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振兴中华,努力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思想和文明成果,并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① 本书正是依照江主席的这段讲话精神,选取了从西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两千余年间 50 位走出国门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外交等不同层面来展现中华民族善于对外开放,勇于走向世界的历史风貌。

在古代中国,汉唐盛世不仅体现在传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相对发达与较高的领先水平,而且也反映在对外交流与交往中的博大视野与做出过的撼世之举。中华文明之所以丰厚而多彩、历久而弥新的重要原因,既有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内部动因,也包含着中外交流的外部成因。还在远古时代,《易经·系辞》有关黄帝“剡木为舟,剡木为楫”的传说,《诗经·商颂》关于

^① 江泽民:《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1997 年 11 月 2 日。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记载，《汉书·地理志》对于箕子到朝鲜“教其民以礼仪，田桑织作”的记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关徐福东渡“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的描写，等等，尽管其中不乏有想象性的传说色彩，但也反映出自汉代以前中外文化的交流已渐露端倪。随后，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较长时期统一的并国势强盛的朝代，由张骞出使西域揭开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史记》作者司马迁称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为“凿空”之举，当代学者也称“张骞凿空”正式开通了走向西方的道路，“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揭开了新的纪元”^①。确实，张骞通西域使得汉朝与西域有了正式的往还，汉代的文化也随之传到西域诸国，汉代西出玉门关、阳关的两条通往西域的道路（后辟为南、中、北三条通道），尽管路途迢迢、峰高岭峻，却没有阻住中外文化交流的延绵不断，于是有“丝绸之路”的美称。此外，汉使译长从我国的雷州半岛乘船出发行抵印度洋的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而归，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自汉至唐的数百年间，中外文化交流的趋势不断扩大，东汉时班超父子再入西域，苦心经营丝绸之路，并派甘英与大秦（罗马帝国）联系，行至波斯湾头；罗马商人秦论于三国时期谒见吴王孙权，并在返国时带走 20 名中国人至罗马帝国；东晋时的高僧法显从陆路到达印度，又经海道经斯里兰卡返回中国在青州牢山（今青岛崂山）登陆；隋朝有常骏等使抵达马来半岛。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着“历代国威，以唐为最”的说法。唐代作为一个国力雄厚、气势恢宏的朝代，在中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上达到鼎盛期。在唐代，陆上丝绸之路由汉代的三条增加为五条，

^① 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14 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海上丝绸之路由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直抵阿曼湾到达波斯湾头的巴士拉,然后从巴士拉到达阿拉伯帝国的首都报达(今巴格达)。唐僧玄奘即沿着陆上丝绸之路经反复辗转到达印度,又净从广州出发经海道抵达印度,唐使王玄策则另从陆路经西藏的新通道三次出使印度,被俘往大食 10 年之久的杜环回到中国后写下了对西亚、北非游历的《经行记》。同时,前来唐长安城的外国人也是络绎不绝,据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长安与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间著名人物荟萃之地”^①。其中日本和朝鲜在长安的留学生居多,日本遣唐使也不断来华。阿倍仲麻吕来中国与鉴真和尚东渡扶桑,更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在唐代,丝织技术的西传,以唐三彩为典型的陶瓷“像流水似地从海路渗透到海外”从而有了“丝瓷之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经中亚西亚传到欧洲,唐朝对佛教、伊斯兰教、景教等外来宗教的兼容并蓄态度,等等,都是唐朝在中外文化的交流方面的盛世映现。对于唐文化放射出的光彩,英国学者威尔斯曾作了这样的描述:“在整个第七、八、九世纪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在这些世纪里,当欧洲和西亚敝弱的居民,不是住在陋室或有城垣的小城市里,就是住在凶残的盗贼堡垒中;而许许多多中国人,却在治理有序的、优美的、和藹的环境中生活。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②

在宋、元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趋向不断扩大。北宋初年,僧人行勤带领一个由 157 人组成的求法团去印度取经;在蒙古

①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 268 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 转引自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62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族的西征过程中,山东道士丘处机为拜见成吉思汗,一直走到阿姆河畔,其随行弟子写有《西游记》记述了中亚的情况;元代的汪大渊两次随商船出海游历,撰有《岛夷志略》,对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东岸的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作了记述。同时,外国的商人、使臣、旅行家以及教士也不断来到中国。其中著名的人物便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他由陆路来到中国并居留 17 年之久,其《东方闻见录》(即《马可·波罗游记》)不但对元大都(今北京)作了较详细的记述,而且对其他城市风土人情及社会状况都有所介绍。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则从海路来中国游历了泉州、广州、杭州等地,并在其游记中称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在宋、元两代,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先后经阿拉伯传入欧洲。

明代前期的郑和下西洋可谓是撼世的壮举。从 1405—1433 年的 28 年间,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到达的地方有东南亚、南亚、东非等国家和地区,穿越印度洋、红海等海域和大洋。郑和下西洋不但把中华文明带到所经过的地方,而且了解了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随同郑和远航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从郑和首次下西洋的时间来看,要比 1492 年意大利人哥伦布率西班牙船队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早了 87 年,比 1497 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带领葡萄牙船队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开通经印度洋到达印度的通往东方的新航路早了 92 年,比 1519 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带领一支西班牙船队开始环球航行早了 114 年。因此,郑和下西洋应当是中国人引以自豪并且需要认真重视的事关国家兴衰的重要历史事件。然而,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明朝政府却走上了自我封闭的道路,尽管万历年间有意大利人利马窦来中国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儒学,但明朝政府已不再有明成祖派

郑和下西洋那样的气势与气度。甚至就连清代的康乾盛世的百余年间,也没有再出现过类似于汉唐盛世那样的开放之举。与此相反,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历险却揭开了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历史的序幕。其原因和结果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

清代的前中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势强盛,经济繁荣,被称作康乾盛世。如果仅从中国历史的视角对汉唐盛世和清代的康乾盛世进行比较,几乎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诸领域基本是一样的模式,而且经历千余年的发展与进步,康乾盛世似乎是活力不减。但是,如果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当中国处在康乾盛世之际的17与18世纪,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崛起之时。早在“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之后,不但使得欧洲的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随之带来的是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等等,所有这一切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是“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①。17世纪40年代,当中国的清王朝在北京建元之际,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18世纪60年代,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其主要标志之一是蒸汽机的使用和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操作,使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美国和法国也分别于1776年和1889年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开始了工业革命。对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这样的描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要大。”^①然而,对世界形势发生的这一重大变迁,清王朝的几代统治者是完全不了解的。固然康熙初年曾废除了清朝开国时的禁海令与迁海令,康熙皇帝本人对中外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并不排斥,甚至任用外国传教士组织测量编绘《皇舆全览图》,乾隆皇帝也曾委托意大利人郎世宁主持圆明园的附园长春园的设计建造。但是,这两位皇帝对世界大势的发展变化并不知悉,他们在位期间就中外交流的交流而言,也没有什么重大举措。康熙皇帝后来又回到海禁的老路上去,乾隆皇帝则颁布了诸如《防范外夷规条》等条文,并只留广州一口通商。如果他们能像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唐太宗委玄奘西游、明成祖遣郑和下西洋那样去了解一下世界,那么也许就不会自我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其实在康熙年间,已有樊守义只身于1707年到欧洲游学十多年,将所见所闻写成《身见录》一书。而这部介绍西方的书籍,在中国从来没有人提起过。18世纪下半期,又有高类思、杨德望二人在意大利和法国学习十余年。法国国务大臣拉尔果与他们交往,并询问一些有关中国的事情。他们于1764年回到中国,却因不是科举正途出身未被重视,其西学的知识也派不上用场。甚至他们的名字和行踪亦无人知晓,今天只能从当时外国人的记载中略知其信息^②。无论是清朝的统治者,还是士大夫阶层,不但没有对外部世界探求的热情和冲动,甚至在怎样对待外部世界和如何认识西方问题上常常闹出不少闭目塞听的、妄自尊大的活剧。乾隆皇帝对英使马戛尔尼来访当作“贡使”对待,并在复英王的信中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108~109页,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夷货物以通有无。”嘉庆皇帝则坚持要英使阿美士德行三跪九叩之礼，就连乾隆允准马戛尔尼只跪一膝行礼才得以觐见的让步也不采纳，在礼仪问题上摆着天朝大国的架子，根本不知19世纪初的英国已经成为海上霸主和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同样，他也曾致函英国国王说：“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器。”道光皇帝更是昧于世界大势的发展变化，直到鸦片战争打了接近两年时，他还在打听英国究竟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就在清朝几代统治者不善于和根本不愿意去了解世界、与外国进行沟通的背景下形成了。对于这一历史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过这样的精辟阐述：“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①史学家戴逸在认真地研究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后指出：“中国社会已经落后于西方，但历史经常被迷雾笼罩着。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可当时中国没有人能够认识清楚这一历史真相，只有岁月推移，迷雾消散，矛盾激化，百孔千疮才逐渐暴露。历史的悲剧只有在悲剧造成以后很久时间，人们才会感到切肤之痛。”^②

有重点地叙述古代中国对外交往和文化交流的轮廓是必要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5页，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的,这对于认识汉唐盛世与清代康雍乾盛世的内在含量是有益的,于此也会明晰地看到走出国门、面向世界这一历史课题对于国家的兴衰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在清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爆发的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中国的民族危难不断加深。但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就没有停止过,中国古代善于了解外情的传统又被发掘出来并不断赋予与近代的社会发展相联系的学习西方以谋进步的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开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河的人物是那些尚未走出国门的但对了解与认识世界又比较关注的有识之士。林则徐是著名的虎门销烟的领导者 and 近代抗击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第一位民族英雄,同时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并开近代关注蔚蓝色海洋和加强与重视海防思潮的先河。林则徐善于了解外情的举动,受到接替他的钦差大臣琦善的嘲笑。琦善说什么:“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林则徐在上奏中提出的“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的请求,被道光皇帝朱批为“一片胡言”^①。接着,林则徐在革职留粤时又向广州将军奕山提出了“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的建议,并强调“此系海疆长久之计”,结果也未能如愿。这表明在长期闭关锁国的影响下,要睁眼看世界和“师夷长技”是何等的艰难。然而,林则徐的这些主张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步被人们所重视,并且成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强音。魏源在编纂《海国图志》时说:“《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8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① 在19世纪40年代，魏源把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和他编纂《海国图志》称作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之举，反映的正是那个年代从闭关到开放的历史性转折。林则徐、魏源并未走出国门，却能主动地去了解世界。随后而出现的走出国门的人们，也在另一层面更直接地亲身接触到了国外的发展变化，同样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因此，借用魏源“前驱先路”一语来描述走出国门的先驱者是非常恰当的。

容闳称得上是近代中国寻求西学东渐之路的先驱。1847年，也就是《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刊于扬州那年，容闳乘船远涉印度洋和大西洋，从中国到达美国。他迈出国门，并非清政府的派遣，而是个人的意愿。他学成于美国耶鲁大学后，回到中国施展其才华。中国近代化起步时期，从洋务企业购买机器到清政府派出第一届留学美国的幼童，容闳均起到重要作用。他走出国门的自我历史记载取名为《西学东渐记》，寓意颇为深刻。容闳的美国之行，开了近代中国人走出国门潮流之先河。

清政府正式向国外派遣使团是1868年的事情，尽管此前西方列强已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特别是依据1860年签订的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已向北京派遣了常驻公使。耐人寻味的是，清政府仍然不情愿遣使国外，却是在1866年利用担任中国总税司的英人赫德回英国完婚之机派出一个考察团赴欧洲，况且这还是在洋务派的不断筹画和积极奔走的情况下促成的。于是有斌椿、张德彝等人的欧洲之行。1868年，清政府正式派使团赴欧美。也许让人感到荒唐的是，这个使团是由已经任期届满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率领的，但其中夹着中国

^① 《魏源集》，上册，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官员志刚等人,也算是清政府的“体面”之处了。尽管这个使团的派出不是光彩之举,毕竟清政府在无奈之中也只有如此选择了,国际交往与交流的大趋势迫使清政府卷入进来。正是这次出使,西方人见到了龙旗在他们的国土上飘扬,志刚的记述也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直到1876年,清政府才向外派出常驻公使,郭嵩焘成了第一位驻外公使。更为糟糕的是,这次遣使是缘起于英国侵略者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事件去向英国政府“道歉”。本来,中国的大多数士人对出使国外就不以为然,“师事夷人为耻”的观念还根深蒂固,况且这次出使又是为所谓的“道歉”而往,一时间那“焉有正士,而屑为此者”的议论沸扬而起。郭嵩焘不但顶着舆论的压力毅然出使,而且把在国外的见闻写成《使西纪程》,对西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他写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①郭嵩焘的这一见解颇有启发意义,并且超越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认知水平。与郭嵩焘同时出洋的副使刘锡鸿写有《英轺私记》,其思想的僵化与愚昧实在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他把西方的科学技术视为“杂技之小者”,自称“君子不为”。他通过对英国社会的考察,竟写下了如此一段奇文:“英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论国政则由民以及君,论家规则尊妻而卑夫,论生育则重女而轻男,论宴会则贵主而贱客,论文字则自右而之左,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论饮食则先饭而后酒”,原因在于“其国居于地轴下,所戴者地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②。《使西纪程》因说了西方“政教修明”而遭到国内顽固派的攻击,并被毁版;《英轺私记》却得到不少守旧者的赞誉。郭嵩焘与刘锡鸿在同时被清

① 《郭嵩焘日记》,第3册,124、13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版。

② 刘锡鸿:《英轺私记》,20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

政府召回后,前者迫于各方压力告退还家,后者又继续当着京官。此二人的不同境遇,反映出晚清社会在是否向西方学习问题上士大夫们的价值取向。当然,作为参赞随同郭嵩焘出使的黎庶昌所撰《西洋杂志》却通过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描述,体现出了走出国门者对新鲜的外部世界的好感。1877年,清政府派何如璋任驻日公使,其随行的参赞黄遵宪不但施展了外交才华,而且发展成为维新思想家。清政府于1876年和1877年分别向英国、日本派出驻外公使,推动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此后,驻外公使如曾纪泽、薛福成等人不但尽力完成外交使命,而且善于探索西学的精华,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直到民国年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力挽主权的举动,抗战时期驻美大使胡适以兼采中西文化的特点成为“书生大使”,表明在外交领域中外交往与文化交流是相辅相成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随同公使出国的夫人中,单士厘可为妇女界的杰出代表。

官派留学生的派出也是近代从闭关走向开放的一个标志。1872年,清政府派出了第一届留学美国的学生,此为中國官派留学之始。这30名幼童在美国学习期间,大多成绩优秀,却因被认为是沾染了西方的习俗而被提前召回国内。尽管这批留学生未完成学业,并在回国后遭到冷遇,但其中有不少人经过努力成为优秀人才,詹天佑便是他们中的一员。1877年,清政府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中选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欧洲的学生,其中严复、刘步蟾等人作为海军生到英国学习海军。其实,严复还在留学英国的前一年,就驾驶着福建水师“扬武”号炮船出访日本,开了中国军舰首次访问外国的先例。据1876年2月5日的《万国公报》记载:“福州船政局之扬武炮船,昨由烟台出洋,为练习海道起见,其至日本洋,日人颇生艳羨。嗣入内港,气势昂藏,足令日人骇异……现该船将往近日京之约夏马大城小住。

后回上海抵福州，满拟来春游历英美各国并欧罗巴洲等处。此举殊足壮中朝之威，而使西人望风额庆也。”^① 严复不但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和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大学，而且以翻译《天演论》闻名成为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清末新政时期广派留学的结果，使黄兴、邹容、陈天华和巾帼英雄秋瑾等人通过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探索，走上了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道路。

走出国门的先驱者，有很多人是从不同的方式和道路上为近代中国向西方求真理的探索历经艰辛。王韬早在1867年便从香港启程抵达英国，他感到的是“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界”。1876年，李圭作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到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并以“环游地球客”的身份写下《东行日记》，文中称：“地形如球，环日而行，日不动而地动。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圭初颇疑之，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② 1878年，年仅12岁的孙中山从广东香山经香港乘船东渡太平洋来到檀香山。他对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感想是：“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后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在日本创立中国同盟会以及多次游历欧美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历程中，形成中西合璧的并有所创新的文化观，即孙中山所说的“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③ 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日本。此前，他们虽未迈出国门一步，却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并强调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他们奔走

① 朱有珮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450~45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31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③ 《孙中山全集》，第7卷，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海外后,康有为称其是“漫游世界尝百草”,梁启超在1899年12月30日乘船将抵檀香山之际所作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表露了他的心境:“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①在1927年7月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志邓演达毅然前往苏联莫斯科,随后来到德国柏林。他在国外注重对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从世界发展的视角来探讨中国的革命。宋庆龄曾评述道:“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是那樣的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处处引人叹服。”^②

在中外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历程中,许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学术、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领域,以他们博学广识、多才多艺的文化积淀,为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联系与沟通架起桥梁。辜鸿铭这位被称为文化怪杰的人物,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檳榔嶼,祖籍福建同安,他13岁到欧洲求学可视为接触西方文化的开始,但他常以中国人传统的眼光看待欧洲文明并写下《中国人的精神》这篇名作,试图通过“阐明中国人的精神,并揭示中国文明的价值”,说明研究中国文明“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以使“所有欧美人民都将大获裨益”。在辜鸿铭看来,“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③辜鸿铭的“东方文化救亡论”虽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但他弘扬中国文明的

-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 ② 宋庆龄:《纪念邓演达》,《华商报》1941年10月28日。
- ③ 《辜鸿铭文集》(下),8,35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